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

敦煌文獻整理導論

張涌泉 著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

敦煌文獻整理導論

張涌泉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文獻整理導論 / 張涌泉著.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5. 12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 / 柴劍虹, 張涌泉, 劉進寶主編)

ISBN 978-7-308-15178-8

I. ①敦… II. ①張… III. ①敦煌學—文獻學—文集 IV. ①K870.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27141 號

敦煌文獻整理導論

張涌泉 著

責任編輯 周晶晶

責任校對 王榮鑫

封面設計 項夢怡

出版發行 浙江大學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號 郵政編碼 310007)

(網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開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張 14.75

字數 344 千

版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308-15178-8

定價 45.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中心聯繫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浙江大學文科高水平學術著作出版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

資助

[浙江大學“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編輯委員會

主 編 柴劍虹 張涌泉 劉進寶（執行）

編 委 （按姓氏筆劃排序）

王惠民 施新榮 柴劍虹* 張先堂 張涌泉 許建平

馮培紅 趙聲良 劉 波 劉進寶 盧向前

（加*者是本冊責任編委）

總序

浙江，我國“自古繁華”的“東南形勝”之區，名聞遐邇的中國絲綢故鄉；敦煌，從漢武帝時張騫鑿空西域之後，便成為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世界四大文明交融的“大都會”。自唐代始，浙江又因絲綢經海上運輸日本，成為海上絲路的起點之一。浙江與敦煌、浙江與絲綢之路因絲綢結緣，更由於近代一大批浙江學人對敦煌文化與絲綢之路的研究、傳播、弘揚而令學界矚目。

近代浙江，文化繁榮昌盛，學術底蘊深厚，在時代進步的大潮流中，涌現出衆多追求舊學新知、西學中用的“弄潮兒”。20世紀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獻流散而興起的“敦煌學”，成為“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中國學者首先“預流”者，即是浙江的羅振玉與王國維。兩位國學大師“導夫先路”，幾代浙江學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奮隨其後，薪火相傳，從趙萬里、姜亮夫、夏鼐、張其昀、常書鴻等前輩大家，到王仲華、潘絮茲、蔣禮鴻、王伯敏、常沙娜、樊錦詩、郭在貽、項楚、黃時鑒、施萍婷、齊陳駿、黃永武、朱雷等著名專家，再到徐文堪、柴劍虹、盧向前、吳麗娛、張涌泉、王勇、黃征、劉進寶、趙豐、王惠民、許建平以及馮培紅、余欣、竇懷永等一批更年輕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學術追求，也有各自的學術傳承與治學品格，在不

同的分支學科園地辛勤耕耘，為國際“顯學”敦煌學的發展與絲路文化的發揚光大作出了巨大貢獻。浙江的絲綢之路、敦煌學研究者，成為國際敦煌學與絲路文化研究領域舉世矚目的富有生命力的學術群體。這在近代中國的學術史上，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始創於 1897 年的浙江大學，不僅是浙江百年人文之淵藪，也是近代中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英才輩出的名校。其百年一貫的求是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腳踏實地而又敢於創新的學者專家。即以上述研治敦煌學與絲路文化的浙江學人而言，不僅相當一部分人的學習、工作與浙江大學關係緊密，而且每每成為浙江大學和全國乃至國外其他高校、研究機構連結之紐帶、橋梁。如姜亮夫教授創辦的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原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1984 年受教育部委託，即在全國率先舉辦敦煌學講習班，培養了一批敦煌學研究骨幹；本校三代學者對敦煌寫本語言文字的研究及敦煌文獻的分類整理，在全世界居於領先地位。浙江大學與敦煌研究院精誠合作，在運用當代信息技術為敦煌石窟藝術的鑒賞、保護、修復、研究及再創造上，不斷攻堅克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拓展了敦煌學的研究領域。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原語言文學分會基礎上成立的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也已經成為與甘肅敦煌學學會、新疆吐魯番學會鼎足而立的重要學術平臺。由浙大學者參與主編，同浙江圖書館、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編撰的《浙藏敦煌文獻》於 21 世紀伊始出版，則在國內散藏敦煌寫本的整理出版中起到了領跑與促進的作用。浙江學者倡導的中日韓“書籍之路”研究，大大豐富了海上絲路的文化內涵，也拓展了絲路文化研究的視野。位於西子湖畔的中國絲綢博物

館，則因其獨特的絲綢文物考析及工藝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優勢，並以它與國內外衆多高校及收藏、研究機構進行實質性合作取得的豐碩成果而享譽學界。

現在，我國正處於實施“一帶一路”偉大戰略的起步階段，加大研究、傳播絲綢之路、敦煌文化的力度是其中的應有之義。這對於今天的浙江學人和浙江大學而言，是在原有深厚的學術積累基礎上如何進一步傳承、發揚學術優勢的問題，也是以更開闊的胸懷與長遠的眼光承擔的系統工程，而決非“應景”、“趕時髦”之舉。近期，浙江大學創建“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舉辦“絲路文明傳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都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邁出的堅實步伐。現在，浙江大學組織出版這一套學術書系，正是爲了珍惜與把握歷史機遇，更好地回顧浙江學人的絲綢之路、敦煌學研究歷程，奉獻資料，追本溯源，檢閱成果，總結經驗，推進交流，加強互鑒，認清歷史使命，展現燦爛前景。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編委會

2015年9月3日

出版說明

本書系所選輯的論著寫作時間跨度較長，涉及學科範圍較廣，引述歷史典籍版本較複雜，作者行文風格各異，部分著作人亦已去世，依照尊重歷史、尊敬作者、遵循學術規範、倡導文化多元化的原則，經與浙江大學出版社協商，書系編委會對本書系的文字編輯加工處理特做以下說明：

一、因內容需要，書系中若干卷採用繁體字排印；簡體字各卷中某些引文為避免產生歧義或詮釋之必需，保留個別繁體字、異體字。

二、編輯在審讀加工中，只對原著中明確的訛誤錯漏做改動補正，對具有時代風貌、作者遣詞造句習慣等特徵的文句，一律不改，包括原有一些歷史地名、族名等稱呼，只要不存在原則性錯誤，一般不予改動。

三、對著作中引述的歷史典籍或他人著作原文，只要所注版本出處明確，核對無誤，原則上不比照其他版本做文字改動。原著沒有注明版本出處的，根據學術規範要求請作者或選編者盡量予以補注。

四、對著作中涉及的敦煌、吐魯番所出古寫本，一般均改用通行的規範簡體字或繁體字，如因論述需要，也適當保留了

一些原寫本中的通假字、俗寫字、異體字、借字等。

五、對著作中涉及的書名、地名、敦煌吐魯番寫本編號、石窟名稱與序次、研究機構名稱及人名，原則上要求全卷統一，因撰著年代不同或需要體現時代特色或學術變遷的，可括注說明；無法做到全卷統一的則要求做到全篇一致。

書系編委會

目 錄

走近敦煌	(1)
------------	-----

第一編 定名論

壹 敦煌文獻定名研究	(21)
貳 俄藏未定名《八陽經》殘片考	(52)
叁 敦煌寫本羽 326 號殘卷敘錄	(86)

第二編 綴合論

壹 敦煌殘卷綴合研究	(95)
貳 《八陽經》敦煌殘卷綴合研究	(120)
叁 《瑜伽師地論》系列敦煌殘卷綴合研究	(157)
肆 國圖藏《梵網經》敦煌殘卷綴合研究	(186)
伍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殘卷綴合研究	(230)

第三編 斷代論

壹 敦煌寫本斷代研究	(253)
貳 敦煌本《文心雕龍》抄寫時間辨考	(270)

第四編 抄例論

壹 古代寫本鈎乙號研究	(277)
貳 敦煌寫本省代號研究	(294)

叁	敦煌文獻習見詞句省書例釋	(307)
肆	敦煌寫本標識符號研究	(322)
伍	古書雙行注文抄刻齊整化研究	(355)

第五編 校讀論

壹	敦煌文獻校勘方法例釋	(387)
貳	《敦煌變文集》底本選擇不當之一例	(415)
叁	敦煌變文校讀札記	(428)
肆	《敦煌歌辭總編》校釋補正	(438)
伍	敦煌地理文書輯錄著作三種校議	(447)

走近敦煌

我曾屬於被耽誤的一代。上大學前，下過鄉，幹過搬運工，做過磚瓦匠，當過代課教師。這段時間艱苦生活的磨練，使我懂得珍惜，培養了我堅韌耐勞的品格。1977年，我趕上了“文革”後高考的首班車，成了被耽誤一代中的“幸運兒”。更幸運的是，上大學以後，我碰到了許許多多的好老師。在杭州大學讀本科時，我們古代漢語課的任課老師是郭在貽先生，他激起了我對古代語言文字的濃厚興趣；我大學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是蔣禮鴻先生，他使我知道了什麼叫敦煌變文和俗語詞；1984年，已屆而立之年的我又考上了杭州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是郭在貽老師，他引領我走向了“敦煌”。

20世紀80年代，在蔣禮鴻先生的影響下，郭老師的研究方向轉向了以俗字和俗語詞研究為核心的敦煌語言文字研究，並發表了《唐代白話詩釋詞》等一系列論文。在郭師的影響和熏陶下，我也對敦煌學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和深深的迷戀。1985年暑假，我出差去上海，隨身攜帶了王重民等編的《敦煌變文集》上下冊，有空就讀上幾篇。很快我就發現該書校勘方面存在着不少問題。其中有些前賢已經指出，有些則沒有指出。當時我想，造成這麼多問題的原因何在？其間有沒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可以總

結？回杭州後，我向郭師談了自己的想法。郭師領首點贊，他要我分條寫成專文。後來郭師因病住院，在病床上，郭師仍不時地關心着文章的寫作情況。每寫成一條，就讓我讀給他聽。後來病情稍有好轉，郭師就讓我帶上文章的初稿，陪他到醫院外面走走。洪春橋邊的茶室，植物園中的小亭，飛來峰下的石礮，郭師抱病爲我審讀論文的情景，今天仍歷歷在目。這篇題爲《敦煌變文校讀釋例》的文章寫成後，郭師專門寫了一篇評語，對我這篇今天看來并不成熟的論文，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體現了郭師對我們年輕一代的熱情扶持和殷切期望。在郭師的大力舉薦下，後來這篇長達三萬餘字的論文分上下篇分別在《杭州大學學報》和《敦煌學輯刊》上發表了，對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學子來說，那是多大的鼓舞啊！

1986年夏天，我完成了兩年的研究生學習。由於郭師力薦，我得以留校任教，從而正式踏上了我至今仍深愛着的敦煌學研究道路。

二

在撰寫《敦煌變文校讀釋例》一文的過程中，我曾把《敦煌變文集》中的一些疑點與敦煌變文的寫本原卷（縮微膠卷）核對了一遍，結果發現該書的疏誤大多與編者的誤錄有關；而當時發表的大量校勘、詞語考釋的論著大都依據《敦煌變文集》的錄文，没能核對敦煌寫本原卷，以致郢書燕說的例子舉不勝舉。而且這些論文散在報刊，讀者查檢不便，不利於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如能匯輯各家校說，並核對敦煌寫本原卷，編輯一個敦煌變文的新校本，那該有多好啊！我和郭師談了我的想法，郭師亟表贊許。由於這一項目規模很大，正好當時黃征師弟也在郭師的指導下從事

王梵志詩校勘方面的研究，熟知敦煌文獻，於是郭師便決定由我們三個人合作，一起來做這項工作。

1987年4月，在杭州富陽舉行的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年會上，郭師正式提出了編著《敦煌變文匯校》一書的設想，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呂叔湘、項楚、王鐸等著名學者都對我們的工作表示積極的支持。後來郭師又和我們一起討論，提出編著《敦煌變文集校議》和《敦煌吐魯番俗字典》二書的計劃，這樣，加上《敦煌變文匯校》，就是郭師和我們合作撰著的“敦煌學三書”。

“三書”的設想和寫作步驟大致是這樣的：在前人校勘的基礎上，通過核對敦煌寫本原卷，對《敦煌變文集》的失誤逐篇寫出補校論文，在刊物上公開發表，廣泛徵求意見，然後加以修改并系統化，形成《敦煌變文集校議》一書；在《敦煌變文集》的基礎上，增補其所未備，匯輯各家校說，并以己意加以按斷，形成集大成的《敦煌變文匯校》一書；廣泛調查搜集敦煌、吐魯番寫本中的俗字，并與傳世字書、碑刻等文獻中的俗字材料相印證，上討其源，下窮其變，勾勒出每個俗字的淵源流變，形成《敦煌吐魯番俗字典》一書。

1987年春夏之交，“三書”的第一種《敦煌變文集校議》的撰著工作正式啓動。我們首先複印了所有當時能搜集到的敦煌變文研究方面的論著，并把與校勘有關的部分按《敦煌變文集》的頁碼順序逐篇逐句逐字剪貼匯輯在一起；然後我和黃征冒着酷暑，用整整一個暑假的時間，借助閱讀器把《敦煌變文集》所收變文與寫本縮微膠卷核對一過，并做了詳細記錄。在此基礎上，我們便開始逐篇撰寫補校論文。我們三人的分工情況是這樣的：黃征負責《敦煌變文集》上冊各篇補校論文的撰寫，我負責下冊各篇補校論文的撰寫，初稿完成後，互相交換校閱一過，再呈交郭師審閱，最後由執筆人寫定。

在郭師的悉心指導和直接參與下，《敦煌變文集校議》的寫作

進行得相當順利。1988年初，即已有多篇論文寄交各刊物發表。1988年5月20日，郭師在寫給西北師大趙逵夫教授的信中說：“弟與張、黃兩位青年朋友合作撰寫的敦煌學三書，其中《敦煌變文集校議》一稿將於年底藏工，全稿約三十萬字。此稿專談我們自己的看法，自信不無發明，其中俗字和俗語詞的考釋方面，尤多獨得之秘。”

1989年初，正當《敦煌變文集校議》全書即將完稿的時候，敬愛的導師匆匆離開了我們，這使我們感到無限的悲痛。郭師在留給我們的遺囑中寫道：

涌泉、黃征：

匆匆地告別了，萬分惆悵。你們要努力完成我們的科研規劃，爭取把三本書出齊，以慰我在天之靈。有件事拜託你們：請把我未收入《訓詁叢稿》的文章搜集起來，編一個續集，過幾年後爭取出版（現在當然不可能），為的是賺點兒稿費，以貼補我的家屬，我個人則無所求也。

在病床上，郭師又多次和我們談起“三書”的撰著、出版，其情其景，催人淚下。

完成郭師的遺願，當然是我們弟子義不容辭的責任。在許多郭師生前認識的不認識的朋友的關心和幫助下，我們把郭師的遺稿整理結集為《郭在貽語言文學論稿》《郭在貽敦煌學論集》《郭在貽文集》《新編訓詁叢稿》，先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中華書局、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敦煌學三書”的第一種《敦煌變文集校議》1989年底定稿以後，次年11月即由岳麓書社出版。該書後來評獲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和國家新聞出版署首屆古籍整理圖書獎。

1989年下半年，《敦煌變文集校議》向出版社交稿後，我和黃征便開始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敦煌變文匯校》（後易名為《敦煌變

文校注》)上來。考慮到敦煌變文寫本多俗字、俗語詞,此類字詞,識解匪易;字典辭書,又多告闕如;而以往校錄的失誤又往往與這類字詞有關,要糾正這種失誤必須指出失誤的原因,才能使讀者信服,所以我們決定在匯校的同時,適當增加一些注的內容,對那些字面生澀而義晦或字面普通而義別的俗字、俗語詞酌加箋釋,以便讀者。姜亮夫先生在序中稱《敦煌變文校注》“重在俗字、俗語詞之詮釋,以俗治俗,勝義紛紜”,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該書的特色所在。這也是我們後來把書名由“匯校”改為“校注”的原因所在。《敦煌變文校注》的另一個特色在於“匯校”。我們把當時所能見到的與敦煌變文校勘有關的一百多篇(部)論文(著作)中的重要成果全部薈萃其中,並加以自己的按斷,既免讀者翻檢之勞,又不難得出各家校說的優劣短長所在。姜序稱該書“為敦煌變文校理之集成之作”,自然也非虛言。另外,我們在逐字逐句校核敦煌變文寫本原卷的同時,還注意歸納總結敦煌寫本的書寫特例,並自覺用這種特例去指導敦煌變文的校勘工作,從而糾正了前人在這方面的不少疏誤。

《敦煌變文校注》的撰寫和排錄,花了我和黃征五六年的時間。1997年5月,這部160多萬字的著作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得到學術界較高的評價,並先後評獲新聞出版署優秀古籍整理圖書獎一等獎、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和首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後來又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評為建國以來首屆向全國推薦的優秀古籍整理圖書。“三書”的另一種《敦煌吐魯番俗字典》則後來由黃征編纂了《敦煌俗字典》,我主編的規模更大的《敦煌異體字大字典》則仍在資料搜集之中。